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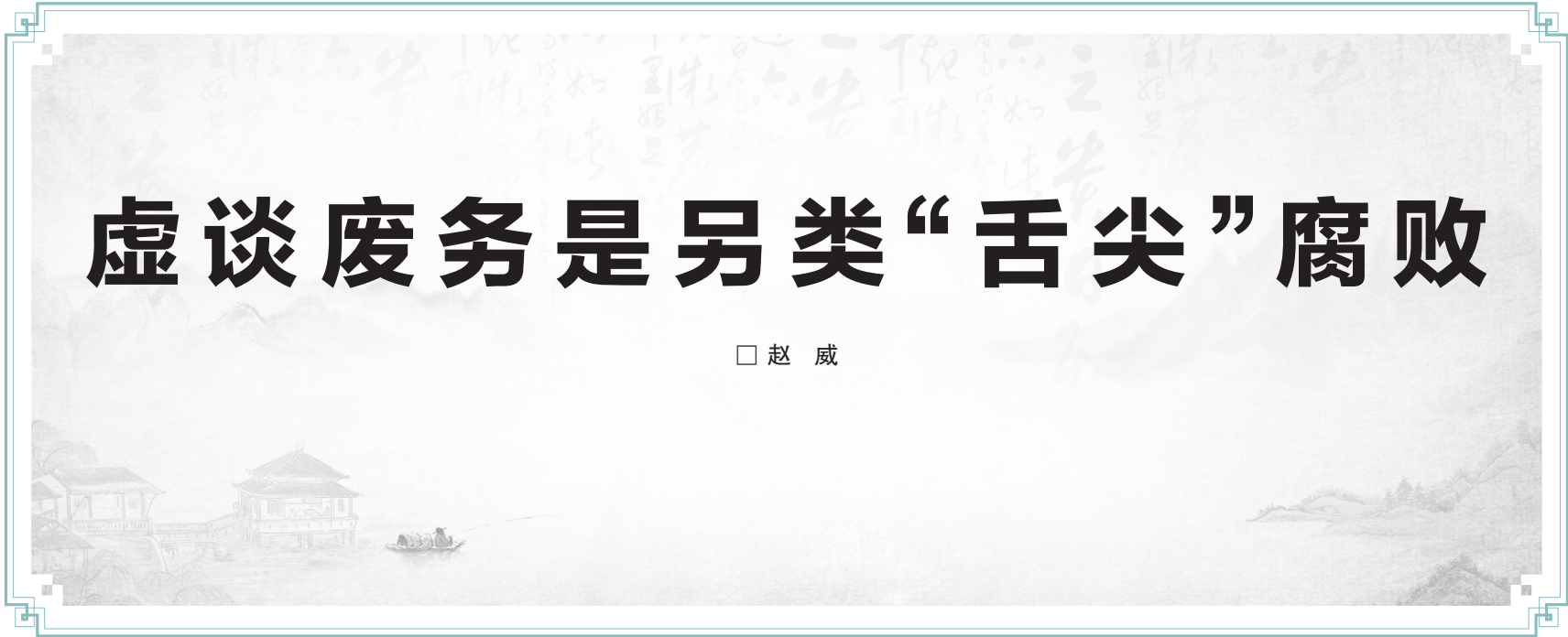
能言善辩之士的鼻祖，要上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孔门弟子宰我、子贡，当时列国合纵连横，舌辩之士受到空前重视，思维敏捷、善于辞令逐渐成了士大夫不可或缺的才能。秦汉以降，士林臧否人物、议论朝政是制造舆论的手段，时称“清议”。大约到了东汉末年，党锢之祸起，在政治暴力的作用下，“莫谈国是”渐成共识，清议之士或三缄其口，或改谈抽象义理，开清淡之先河。此风起于东汉郭泰，发扬于曹魏正始年间，成于“七贤”之一的阮籍。

魏晋时代，对德才同异和名教、自然的论争，事关政治站队。嵇康被杀，影响了一大批人，清淡由开始的关注实际问题，转向务虚，晋室衣冠南渡后，改为只谈玄理，清淡便失去政治意义，做了名士身份的点缀。早在司马昭掌权时，七贤中的阮籍便是莫谈国是、苟全性命的典型，连司马昭都佩服，认为他是天下最谨慎的人，每次与他交谈，“言及玄远，而未曾评论时事、臧否人物”。主张名教的人一直想杀他，在司马昭的保全之下，阮籍得以寿终。

比之借国帑满足口腹之欲的腐败，清谈误国是否尖上的“另类腐败”。学士谈玄论道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于世事无益，倒也没有大害。而把持朝政的士大夫整日以清谈为事，想方设法保全自己，就是不务正业了，清谈误国之舌尖腐败指的就是他们。最典型的例子，便是身居高位的王衍“虚谈废务”，导致“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”。

潜心“养望”

王衍是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王戎的从弟，出身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琅琊王氏。王衍长相俊秀，是个美男子，借用时下流行语“小鲜肉”“娘炮儿”形容他，或许更贴切一些。王戎说自己这个弟弟“神姿高彻，如瑶林琼树，自然是风尘外物”，王导说他“岩岩清峙，壁立于仞”，王敦评价他“处众中，如珠玉在瓦石间”，单论相貌，可与卫玠、潘安看齐。这也符合当时清淡之士的特征，不仅辩论时口



虚谈废务是另类“舌尖”腐败

□ 赵 威

若悬河、辞藻华丽，讲求学理思辨，还要掌握音律节奏、举止风度，而且人长得也要好，生有几分妇人姿色，如唇红齿白、肌肤如玉。王衍在当时乃清淡名士，不是浪得虚名的，各种条件都符合这一身份。

“竹林七贤”身后，清淡不再是单纯展现才情的手段，而成了进仕的终南捷径。年轻的士子先要标新立异，崇尚老庄，言必称玄，行为举止都异于常人，一副不食人间烟火之态，实则难脱沽名钓誉之嫌，是为“养望”。等名望积攒到一定程度，便会引起士林关注，自然有庙堂之人来请君出山，这时候就要根据自己的门第、师友关系、名望、学识等拿捏分寸，是拒绝推脱，还是欲推还就、欲擒故纵，火候掌握自己手中。像谢安那样，在一推再推中，名望倍增，一出山就是显要职位。年轻的王衍怎懂得此种道理，出身高门的他，门第有了，差的就是名望了，于是，一心扑在清淡高论上，自比子贡，尚书卢钦曾举荐他为辽东太守，王衍坚辞不就，从此不论时事，一心谈玄。

名利双收

常言道，3岁看老。王衍的父亲王又官至平北将军，曾受到言官弹劾，罢免其官职的公文一到，他就派人去理论，没有结果。当时，年仅14岁的王衍正好在京城，便为此事去找尚书山涛和仆射羊祜理论。王衍风姿

才华出众，言语表达畅快，事理陈述充分，把山涛给镇住了。当他走后，山涛由衷地赞叹道：“生儿不当如王夷甫？”（或许这是辛稼轩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一句的灵感之源？）羊祜却说：“乱天下者，必此子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将来祸乱天下的，一定是这个人。

王衍的“名士风流”还表现为视金钱如粪土，俗话说，“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”，红花还得绿叶衬，他的妻子就是衬托王衍品行的另一种人，见钱眼开，王衍常常为她感到羞耻，并称钱财为“阿堵物”。王衍的名声一升再升，朝野人士都很仰慕他，称他为“一世龙门”。后来，就连晋武帝司马炎都请他出来做官，王衍感觉时机已到，出为太子舍人，很快官至尚书令。与嵇康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不同的是，王衍等人把名教当作进身的手段，为了为自己辩护，他们提出“名教”等同于“自然”的歪理邪说。阮宣子有美名，王衍问他：“老庄与名教有何不同？”回答：“将无同。”王衍大加赞赏，立马给他封了个官。名教与自然相同，即达官与名士可集于一身，朝端富贵与林下风流可名利双收，王衍做到了。

狡兔三窟

王衍还有一个本领——会攀高枝，他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遹为妃，后来，司马遹遭到贾后诬陷，他写信求救于王衍，王衍却害怕惹祸上身，

不但不坚持正义，将信件私藏起来，还让女儿跟太子离婚。他的这种苟且偷生、缺少铮铮铁骨的做派，为人不齿，贾后倒台后，有人便上书弹劾他。后来，他被成都王司马颖相中，做了中军师，屡次升迁，光熙元年（307年），官至宰相。在当时皇权相对弱势的时代，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社会看出身、重门第，士人拼命让家族掌握政治话语权，王衍也不例外。他虽然身居高位，但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苟全性命于乱世，让王氏家族得以绵延长久。

王衍为自己精心谋划了一条退路。八王之乱后，东海王司马越击败长沙王、成都王、河间王等诸王势力，掌控西晋大权，当时青州和荆州是物产富饶的军事重镇，他向司马越进言：“中原业已大乱，要靠文武兼备的重臣出镇地方。”举荐了自己的胞弟王澄任荆州刺史，族弟王敦任青州刺史，并恬不知耻地嘱咐二人：“荆州有长江、汉江之险，青州背靠大海，你们出镇荆、青二州，我留守京师，咱们王家可谓三窟了。”狡兔三窟的王衍，受到世人鄙夷。

为敌不齿

西晋八王之乱，加上清淡之士把持朝政，终于导致五胡乱华，国破家亡。永嘉二年（308年），匈奴人刘渊称帝，建立汉赵，开始进攻西晋。危急之下，朝廷把王衍推向前台，担起了抵抗匈奴军队的重任，他多次推脱

卸责，不肯接受封爵。永嘉五年（311年），元帅司马越在首都洛阳危急时刻去世，于是，众人推举王衍为元帅。王衍再次胆怯，推辞道：“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愿望，是朝廷一再找上门来，才累迁至现在的位子。今日面对如此大局，怎能让我这样一个毫无才

知识链接

话说“虚谈废务”

两晋时期的士大夫尚虚避世与国运的衰竭有直接关系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：右将军王羲之和太傅谢安一起登临冶城（在今南京城西），谢安以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悠闲地翘首远望，王羲之却没有谢安的气定神闲，因为他对当时的清谈之风极为不满，于是对谢安说：“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目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。而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意思是说，夏禹终日操劳国事，手脚都长了茧；周文王忙到天黑才吃上饭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现在国家四周敌人的营垒很多，人人都应当自觉地为国效劳。而空谈荒废政务，浮辞妨害国事，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做

的。其实谢安倒不是真的虚谈废务，而有的身居要职的人却真的是虚谈误国，两晋王衍即是其中一位。他因高谈阔论成名，年纪尚轻就迅速进身，后来却在军中推脱使命，最终身死国灭，死时自叹曰“祖尚虚浮未戮力以匡天下”而遭此下场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，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德”。人在事上练，刀在石上磨。有些干部，看简历有基层工作经历，但并没有经过实实在在的磨炼。有的“名在人在不在”，有的“身在心不在”，这是混基层经历的！战国赵括纸上谈兵、两晋学士虚谈废务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。

「真宰相」刘沆

□ 刘立祥

政声满天下

刘沆自幼聪颖好学，所居村子北面临后隆山，唐代名相姚崇当年曾寄居于山中聪明洞，另一宰相牛僧孺曾在山上建读书堂。刘沆听着父辈讲述姚崇、牛僧孺的故事渐渐长大，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立志有所作为的种子。他不负先辈厚望，刻苦向学，饱读诗书，学得满腹经纶，为人超逸雄豪，风流倜傥，闻名遐迩。

然而，学富五车的刘沆在科考之路上却出人意料地屡屡名落孙山。在挫折面前刘沆选择了放弃，自称“退士”。父亲刘素苦口婆心地劝他振作起来，用姚崇、牛僧孺的故事激励他奋发努力，不轻言放弃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宋仁宗天圣八年（1030年），36岁的刘沆终于考中进士，而且名列前茅，考取了第二名。

随后，朝廷任命刘沆为大理寺评事、舒州通判。当时，章献太后建资圣寺佛塔，“内侍张怀信挟诏命，督役严峻，州将至移疾不敢出”，刚刚踏入仕途的刘沆，初生牛犊不畏虎，毅然上疏朝廷，弹劾张怀信。恃宠为虐的张怀信随即被罢免。

朝廷上下无不对刘沆刮目相看。不久，刘沆调任太常丞、值集贤院，出任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知州。据南宋桂万荣撰《宋阴比事原编》，其时，衡州有一姓尹的富户，欲强买邻人田宅，遭到拒绝，便软硬兼施，屡次制造麻烦，企图逼邻人就范。邻人孤老子幼，相依为命，无端遭尹家欺侮，愤愤不平，一口气憋在胸口，遽然撒手人寰。于是，尹氏便伪造地契，驱逐幼子，霸占田产。邻人孤子诉于州县官府，历经20年，案子一直久拖不决。

刘沆到任后，孤子再诉，尹氏拿出地契和20年来缴税的票据为证。

刘沆验查后说道：“如果你家果真有田百顷，所交的赋税何止这么一点？再者，你那田契签订的时候不会没有证人吧，如今，前后左右邻居大多都还健在，什么时候把他们都请来问一问，事情不就水落石出了。”尹氏一听，知道再无法胡搅蛮缠下去，只得唯唯服罪。

消息传出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。

上疏革“三弊”

陕西连年灾荒，饥民遍地，民不聊生。张海、郭遵山率领的起义军久已盘踞在商山之中，此时借助灾年的混乱局面，招兵买马，队伍迅速扩大，声势更加强盛。他们攻城略地，开官仓，劫民舍，所向披靡，到了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已严重威胁到京城开封的安全。朝廷派出大批官兵镇压，久久不能遏制起义军的凌厉攻势，战火迅速蔓延。

刘沆去见宰相，极言围剿之役的危害得失，阐述自己的意见。宰相拂然变色，揶揄道：“等哪一天你做了宰相，再把你这套理论付诸实践吧！”刘沆不卑不亢地回答说：“宰相又不是铁交椅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说不定哪一天，时来运转，我还真能当上宰相！”

至和元年（1054年）八月，刘沆真的做了宰相。

当时，中书省的选官授职混乱不堪，刘沆甫一上任，便向仁宗直言陈当下三弊：一曰近臣保荐，多出私门，“近臣保荐辟请，动逾数十，皆浮薄权豪之流交相荐举”，以致选贤任能成为一句空话。二曰任人唯亲，近臣庇护，造成“当入川广，乃求近地，当入近地，又求在京，及堂除陟陟省府、馆职、检讨之类”，以致边远贫困之地无人愿去。三曰奖罚升迁，失其法度，“其叙钱谷管库之劳、捕贼昭雪之赏，常格虽存，侥幸

犹甚。以法则轻，以例则厚，执政者不能持法，多以例与之”，以致赏罚不明。

刘沆奏请仁宗，务必当机立断，革除上述三弊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力推行改革。仁宗接受了刘沆的奏请，诏令照此施行。

刘沆奉诏大刀阔斧地革除三弊，果断地罢黜奸猾慵懒之徒，荐贤任能，建章立制，加强监督，锐意推行改革，强化中央集权，昔日以权谋私、胡作非为、尸位素餐之徒无不畏惧，天下政局为之一新。当时，欧阳修遭佞臣谗害被贬往同州，刘沆奏请仁宗，举荐欧阳修为翰林学士，与宋祁等同修《新唐书》；又引富弼与其共同主政，勉励富弼奋发向前，大展经纶。

这一下捅了马蜂窝。朝中那些呼风唤雨的权贵，那些沆瀣一气包藏祸心的佞臣，那些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，那些居心叵测的各种利益集团，仿佛听到了集结号般齐聚在“倒刘”的旗帜下，顿时都将炮口对准了刘沆，群起而攻之。御史中丞张昇上疏弹劾刘沆，洋洋洒洒列出刘沆的17条“罪状”。

宋仁宗性格过于温厚，眼睁睁看着刘沆身陷重围，成为众矢之的，自己也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推行改革的决心和种种设想顿时灰飞烟灭。

在万炮齐轰之下，刘沆进退维谷，孤掌难鸣，除了称病求罢，别无选择。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十二月，刘沆罢相，以观文殿大学士、工部尚书知应天府。

“刘公真宰相”

据宋人曾敏行撰写的《独醒杂志》记载，刘沆当宰相时，其家族中人依仗宰相威势，拒绝缴纳赋税。当地官府慑于宰相权威，不敢强行征收，也就网开一面，不再向刘家征

税。刘家拖欠的赋税越积越多，渐渐累积到了几十万钱。

刘沆远在北京，对此事一无所知。

程杲就任庐陵县尉，对前任官员的溺职行为甚为不屑，义正词严，秉公执法，责令刘家必须如数补缴拖欠的所有赋税。这个程杲或许不太为人所知，《宋史》称誉他“慈惠而刚断，居官临事孜孜不倦，温恭待下，率以清慎”，他最早发现了周敦颐，还培育出两个名震千古的儿子——程颢和程颐。

刘家人自恃有人在朝中做宰相，哪里会把一个小小县尉看在眼里，任你一日三催，我自岿然不动。程杲将刘家带头拖欠赋税者悉数抓捕，关进了监狱。刘家虽然一大群人身陷囹圄，却依旧稳若泰山：只要我们家宰相发一句话，看你个小小县尉怎么下台！

于是，几个族人聚在一起，给刘沆写信诉苦，称受到地方官府无端欺侮。令族人没有想到的是信寄出后竟石沉大海，他们左等右等，望眼欲穿，怎么也等不到回音。等到回信的是程杲。原来刘沆收到族人的来信后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立即给程杲修书一封，深致歉意，并对程杲的做法深表赞赏。族人本想背靠宰相这棵大树乘凉，没曾想刘沆竟“胳膊肘往外拐”，仗宰相威势做“特殊人”的念想随之烟消云散，只好赶快将欠下的赋税全部如数补缴。

后来，程杲却任回到了京城，刘沆在宰相府非常恭敬热情地接见了。他。程杲感动不已，逢人便说：“刘公伟量，非他人能及，真宰相也。”

嘉佑五年（1060年），刘沆卒于陈州治所，享年66岁。噩耗传来，宋仁宗悲痛不已，诏命罢朝三日志哀，亲为刘沆墓碑题写“思贤之碑”四个大字，诏赠左仆射兼侍中，并含



泪挥笔写下《挽刘沆》——

早富经纶业，终成辅弼功。

立朝无党势，为国尽公忠。

此日悲遗直，谁人嗣匪躬。

深嗟亡一鉴，何以慰予衷。

读《宋史·刘沆列传》，刘沆那刚正不阿、无所畏惧、一身凛然正气的官品人格，不庇族亲、公正无私、凡事出以公心的坦荡胸怀，忠于职守、秉公执法、心忧天下的恤民情结，“长于吏事，性豪率，少仪矩”、不避艰险、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，使我们不由顿生高山景行之慨。逝者如斯，刘沆虽然早已长逝千年，他作为“真宰相”的光彩形象却千秋万代彪炳于史册，垂范于后世，成为世世代代的人们为政履职的千古圭臬。

人物志